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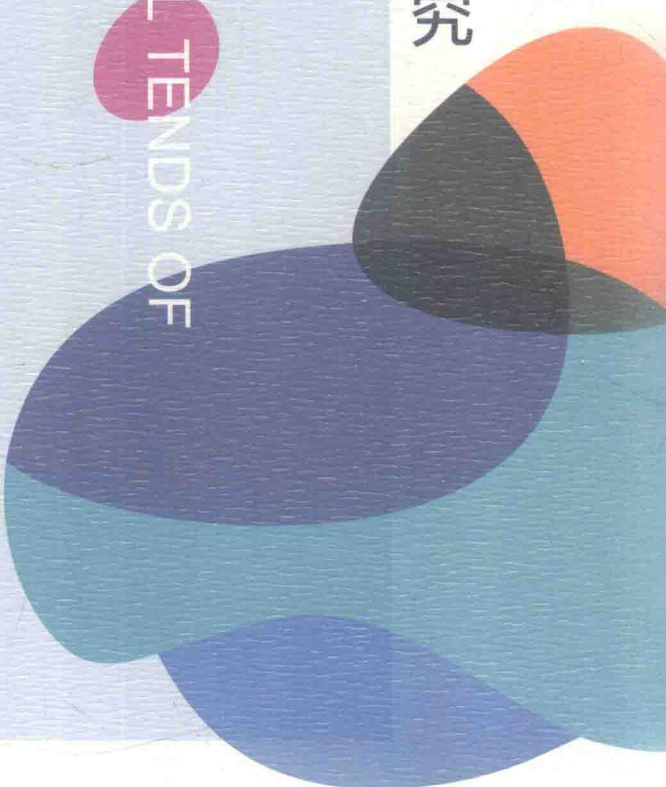
朱美荣 / 著

比较与鉴别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

COMPARISON AND DISTINGUISHMENT

A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TENDS OF SOCIALISM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20周年
暨信息研究所成立周年系列丛书
主编：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朱美荣 / 著

比较与鉴别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

COMPARISON AND
DISTINGUISHMENT
A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TENDS OF
SOCIALISM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与鉴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朱美荣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暨信息研究所所庆40周年系列丛书)

ISBN 978-7-5520-2336-7

I. ①比… II. ①朱… III. ①社会主义—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5818号

比较与鉴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

著 者:朱美荣

责任编辑:熊 艳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15

字 数:205千字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36-7/D·489

定价:7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
暨信息研究所所庆40周年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顾 问

张道根 于信汇

名誉主编

王世伟

主 编

王 振

副 主 编

党齐民 丁波涛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全 李 农 高子平 轩传树 沈结合

俞 平 唐 涛 惠志斌 殷皓洁

总 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历史可以溯源到1959年建立的学术情报研究室,1978年10月正式成立学术情报研究所,1992年12月更名为信息研究所。建所以来,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变化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步伐而不断调整,目前已发展成为从事重大战略信息和社科学术信息汇集、分析的专业研究所,现有在编人员45人,设有6个研究室、1个编辑部和3个院属研究中心,承建“丝路信息网”“长江经济网”两大专业数据库和“联合国公共行政网(亚太地区)”,承办“全球城市信息化论坛”和“一带一路上海论坛”。

成立至今的40年里,信息研究所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专业的学术情报研究资政建言、服务社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所40年是信息研究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未来信息研究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优化学科配置和人才队伍,努力建设以重大战略情报信息研究为重点,以专业大数据库建设为依托,以各类论坛、智库报告为载体的新型情报信息研究体系。

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60周年暨信息研究所建所40周年之际,我们策划了这套院庆暨所庆系列丛书。丛书共8册,内容涵盖科技创新、城市信息化、科学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等领域,既有信息研究所的传

统优势学科,也有近年来新的学科增长点。我们希望以这种形式,总结并展示信息研究所40年的发展历程及最新成就。期待这套丛书能成为本所与社会各界分享研究成果的纽带,也能激励本所员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实现信息研究所的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

王 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

2018年6月

序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封建王朝加速衰败和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下,各种救亡图存的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景。据统计,1905年中文的社会主义报刊已达54种,至民国初年,由于帝制被推翻,自由民主空气一度高涨,更呈现“盛言社会主义”^①的局面。当时报端披露:“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形。”^②

可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以“均富”与“平等”为重要诉求的人类理想,对近代各种思潮都有感染力、辐射力和冲击力,并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倦的选择与追求,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各类有识之士纷纷改换门庭,拥抱社会主义,不同程度地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接踵而至:从洪秀全推崇“天朝田亩”的农业社会主义,到康有为赞赏“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主义;从胡适、傅斯年鼓吹“群己权界”的自由社会主义,到孙中山主张“贫富均等”的民生社会主义;从刘师复传播“互助生存”的无政府主义,到江亢虎策划“自由宪政”的社会民主主义;从周作人、王光祈提倡“工读互助”的新村主义,到张东荪、梁启超推行“产业自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抉择“以俄为师”的科学社会主义,到

①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学说[J].东方杂志,1912,(2).

②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1921-02-25,18(4).

梁漱溟倡导“民族自救”的乡村社会主义；从张仕章变异“耶稣救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到张君勱选定“修正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①那些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倾慕却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代表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这种均贫富、人人为公、各得其所的大同理想构成了社会主义被民众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基础，从而共同吹响了社会主义的集结号，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谱系。

在这众多的思潮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本书作者正是以这四股思潮为研究对象，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各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思想特征，还反映了不同思潮之间的辩驳和交锋。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在与不同思潮的比较和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绝唱，而其他思潮最终都被它的滔滔洪流所淹没。作者为此专设一章，对马克思主义胜出的主要原因作了历史分析和学理探究，从而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思潮，早在500年以前就已经问世，传入中国也已有一个多世纪，一开始它就受到一种道德义愤和主观幻想的支配。如果说这种乌托邦曾是社会大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而选择的一种精神表达方式，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其价值的合理性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不会满足于任何理论的思辨或承诺，它要达到理想社会的目的，必然要摆脱乌托邦的遐想，从而动摇一些思想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假说在经验思维中的合理性。虽然受到社会发

^① 瞿秋白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3—24.

展的客观制约和阶级利益的局限,然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无不以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旗帜,来获得自己学理的社会基础,只是因为不同派别的人士对目标的不同认识,以及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方法与手段的择取上不同,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呈现多元化的复杂态势。

今天,我们需要从狭隘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用一种理性的现代文化意识和全新的视角,去审视社会主义传播史上各派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留下的各种文化遗产,从而对各派思潮进行比较研究和鉴别。譬如,1922年,张东荪等人在《东方杂志》19卷21号上发表的《中华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主张把资本主义视为不可跨越的“卡夫丁峡谷”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虽然有些地方误解了唯物史观,但确为当时的中国提出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的国情?实践证明,张东荪们的一些基本要义经过多年反复的捶打,正被历史证明其所具有的某些合理成分,学理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唤起人们对之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所以,需要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当时历史的背景中去作全面客观的比较分析,这样可能更完整地描绘出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全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具有其价值。

徐觉哉

2018年4月19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五四前夕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	7
第一节 国门初开 西学东渐	7
一、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	7
二、资本危机促使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	9
第二节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	12
一、知识界普遍关注社会主义	12
二、十月革命推进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15
第二章 新村主义：短暂的玫瑰色之梦	19
第一节 新村乌托邦的源起	19
一、异域的新村主义	19
二、新村主义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	22
三、早期知识分子的新村梦想	27
四、乡村自治的短暂实验	31
第二节 主要理论观点	33
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的生活”	33

二、“平和的造成新秩序”	36
第三节 争论和破灭	39
一、“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39
二、“平和”的改良还是“铁血”的革命	44
三、“蔷薇色的梦”破灭了	46
第三章 基尔特主义：发展实业的“温情主义”	49
第一节 输入和流传	49
一、基尔特主义在欧洲	49
二、基尔特主义传入中国	50
三、罗素访华及其讲学	55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论战	57
一、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59
二、中国有无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	64
三、革命还是改良	68
四、论战的影响和意义	72
第三节 销声匿迹	73
一、基尔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内外因素	74
二、失败原因分析	75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一种激进革命的幻想	79
第一节 从欧洲、日本引入国内	79
一、无政府主义在西方	79
二、从零星到系统的输入	81
第二节 派别林立	84

一、天义派	84
二、新世纪派	88
三、民声派	89
四、师复后觉者	96
第三节 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99
一、要不要国家和政府	99
二、要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	104
三、要什么样的自由	109
四、论战的性质与结果	115
第四节 偃旗息鼓	119
一、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	120
二、反对一切强权、一切国家	123
三、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12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与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交锋中脱颖而出	127
第一节 多渠道的传入路径	127
一、传教士的最初译介	128
二、留日学生开辟首条马克思主义输入的路径	131
三、留法勤工俭学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欧洲渠道	140
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苏俄线路	146
第二节 与改良主义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先锋者	149
一、李大钊:阶级斗争是一条金线	149
二、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是“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163
三、瞿秋白:辟一条光明的路	174
第三节 传播的中国化特色	182

一、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精髓	182
二、具有民粹主义的情节	186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胜出的三重主要因素	191
第一节 天时与地利	192
一、战争显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虚伪	192
二、十月革命佐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193
三、救亡图存呼唤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	196
第二节 人和之势	198
一、报刊宣传	198
二、创立社团、开设课程	201
三、多方论战	202
第三节 理论自身的特质	204
一、与中国文化基因的近似性	205
二、集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身	206
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23

导 言

遗忘历史,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思想史的维度也是另一种现实的维度。”^①我们今日研究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史,不仅可以对那一时段的社会主义思潮有正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合法性有深刻的理解,而且也能对现在和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社会主义源于16世纪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周期性经济、政治危机不断显现,社会主义“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形成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到了19世纪,处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深受内忧外患之困扰,为了救亡图存,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做过一系列的尝试。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为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以改变现状,求存图变。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早期已经出现重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危机难以抑制的产物。当时在欧洲游历、学习的中国有识之士如梁启超、蔡和森和周恩来等人都已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腐朽,中国人对西方的向往同当时没落、腐朽的西方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巴黎和会上资本主义列强不顾中国利益,以强权挑战公理的丑陋行径也让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失望。而十月革命的胜利铸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震撼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也点燃了

^① 徐觉哉.思想史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现实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若干问题新探[N].社会科学报,2013-05-16.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一切因素最终促成“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新目标。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借由不同途径传到中国。其中有影响较弱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影响较强的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但是时局混乱，中国乃至世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都比较少，对于“社会主义”国人虽心向往之，但是关于它的基本概念和意义却普遍认识不清，这一现象在瞿秋白所著的《饿乡纪程》中有如实的反映：“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①在这种纷乱迷茫的状态下，各种思潮纷纷通过社团或期刊发表文章和声明，传达思想和主张，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展开论战，争夺群众的关注。各思潮的拥护者也随着争论、比较、了解的展开而不断变化，有的人原先信奉了某种社会主义，可能随后会因为了解转而投入其他思潮的怀抱，比如很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可能曾经深受新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吸引。

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流派中，依据其在中国20世纪早期的影响为依据，本书选择了影响最大的四者——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仔细梳理它们的传播历史和理论观点，再现当时不同思潮之间的理论交锋，以期探索它们或消亡或壮大的根本原因。本书^②在结构安排上按照时间和逻辑的顺序展开。四种主义在文中的出场以其传入中国的大致时间为序，而这种顺序基本上也呼应了四种主义在影响上的从弱到强。第一章分析五四前夕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的背景；第二章分析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幻灭；第三章分析基尔特主义的主要观点和兴衰原因；第四章分析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流

① 瞿秋白，《饿乡纪程》[G]，瞿秋白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5。

② 本书的研究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自报课题资助，本书的出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建所40周年系列学术成果资助。

派、观点和衰落的原因；第五、六两章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观点、理论先锋以及它之所以在当时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博弈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总的来看，本书选择的几大社会主义思潮可以归纳为“温和”与“激进”两类。新村主义和基尔特主义虽然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属于渐进式的、调和的改良主义。新村主义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和基尔特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张东荪都是对暴力革命心存恐惧的温和派；而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暴力革命，属于激进派。对于急切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愿意尝试各种理论，而上述几种社会主义思潮都曾经有一定的拥护者。因为主张变革中国的手段不同，各种主义之间的交锋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交锋，当时的国人才能更清楚地明白各种思潮的主张，并最终选择了符合中国当时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

新村主义因其主帅周作人的推介曾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风行一时。它主张通过建设一个个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运行原则的示范式新村，由点到面，由新村建设逐渐扩展到改造整个社会。周作人认为，循此下去，“旧社会的组织，就是不用激烈的手段去革命，也天然成了时代落伍的东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如此就可以达到“平和的造成新秩序”的目的。^①这种具有改良主义的温馨梦想，对于渴盼改变恶劣现实却又害怕激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激进主义者则反驳说，新村主义的主张就像在“粪土上盖造花园”^②，是难以实现的。在根本制度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新村试验最终因资金困难、社会动荡和缺乏制度保障而夭折。如果说“争论”让民众逐渐看到了新村主义的空想性，那么“试验”的失败则更加证明了这种理论的不切实际。

基尔特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展实业和教育的方式逐步改良国家。基尔

① 积石，新人最应该做的事[J]，新人，1920-04-03(1)。

② 黄绍谷，新村的讨论[J]，批评，1920，(5)。

特主义因其主推者梁启超、张东荪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颇大，加之国际知名学者罗素的助推，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耗时一年多、参加者众的社会主义大讨论。该思潮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当务之急应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不应提倡阶级斗争，而应该走资产阶级的改良之路。这种主张遭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激进主义的批判。在后者看来，基尔特主义虽然理论上说得通，但是难以施行，因为无论是开发实业还是兴办教育都只有在赶走帝国主义、推翻专制、拥有独立自主权的民主国家中才能实现。

上述两种改良之路不是说毫无道理，但是在腐朽的制度下却难以奏效，正所谓“腐肉不去，新肉不生”^①，当时中国的困境已经等不得缓慢的改良。改良与革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史可谓是常见现象。在辛亥革命前，当严复劝说孙中山先从教育入手，待“民品”和“民智”得到提高之后再行革命时，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答之^②。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用铁与血来造就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也是为何主张激进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更大的主要原因。

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属激进派，前者的影响曾一度远远超过后者。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较早，拥有较长的发展时间和较多的派别，在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激进青年中，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主张激进革命，它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它对国家、政府、专政和纪律的盲目反对以及对自由的绝对主张显然脱离现实。故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批评它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它不可能引领群众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③

而要实现革命事业的成功，就“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对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必须通过无产

① 黄绍谷. 新村的讨论[J]. 批评, 1920, (5).

② 王遽常. 严几道年谱[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③ 毛泽东年谱(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74.

④ 李达.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A]. 李达文集(第一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56.